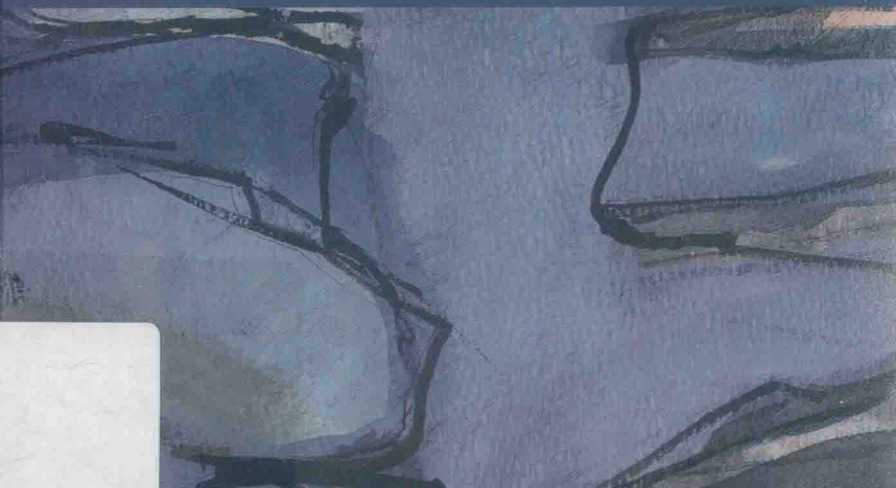




流水账

陈思和 著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流水账

陈思和 著

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水账 / 陈思和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合众文丛)

ISBN 978-7-5439-7490-6

I. ①流… II. ①陈…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
选集②书评—中国—现代—选集③序言—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8047 号

总 策 划: 梅雪林

责任编辑: 王倍倍

封面设计: 右序设计

丛书名: 合众文丛

书 名: 流水账

陈思和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11 000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490-6

定 价: 32.00 元

<http://www.sstlp.com>

自序

这本小书是我继《耳顺六记》以后编定的第16本编年体文集。从1989年起，我发现每隔一两年编一本新写文章的集子，不论厚薄，只是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做个督促，记录一下自己的脚印是如何走的；在当时的出版状况下，这种既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轻灵散文的杂乱文集，是很难受到市场欢迎的。我对于这个奇怪的念头没有任何把握，第一本《笔走龙蛇》还是台湾的朋友帮忙在对岸出版的。第二本是自费出版，印数很少。到第三本《鸡鸣风雨》的时候，我办了火凤凰出版基金，开始顺利起来，到第四本以后就没有再遇到什么困难。这样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自我督促已经融化到我的生命过程的内部肌

理，我的一生几乎就在笔墨键盘中度过。以前我读周氏兄弟的文集，暗暗感佩他们在风雨如磐的环境里，无论多么险恶，无论人生的高扬或者低谷，他们都能够坚持不停地写作，著书立说，褒贬人生。这样的生命状态，看上去似乎有点苦涩，我们从“坟”“而已”“苦竹”“药味”等关键词里都有所体尝，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笔耕不辍本身也是一种对心力毅力甚至体力的考验，体现出中国文人在暗淡乏味的日常岁月下，向着内心丰富一路的找寻和意志。过了六十岁以后我经常地想，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副笔墨一个电脑陪伴着打发无数光阴，那么，这几十年的岁月究竟会怎样走过呢？真是无法想象。

这并非是说，我的日常生活太闲，才需要用写作来填补时间，恰恰相反，我从年轻时期走来，一路上一直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与混乱。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打理时间的人，不会有心计地安排时间及时完成手边的工作，相反，时间在我的生活里永远不够，永远是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它仿佛不是带着我线性地往前走，而是像一团混沌包围我窒息我。我刚刚拼命挣扎出一点空隙，却发现它已经把我裹挟到另一个空间。我经常想起毛泽东诗词里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六个短句里，我只感受到“天地转”（无尽头地

转)，“光阴迫”(生活中永远有事在催促)，生活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不停地转，走不出直径几米的圆，却不知老之将至。这也许就是当下社会的悲哀，也是当下社会中努力做事的人的悲哀。我做事缺乏只争朝夕的精神，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被杂乱的生活所打断，无法安静下来专心做好一件事。学会拒绝也没用，因为拒绝了一件事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件或者更多的事情插入，结果总是离自己的目标更远。

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就成了我的精神慰藉。不管怎么忙乱，我总是不停地用文字留下点痕迹，每一篇文章写成，无论长短好坏，都好像我的挣扎有了效率，捅破混沌伸出头来透一口气，接下来又是被埋在暗无天日之中，直到下一篇文章的完成。所以，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是我的精神最开朗的时候，我仿佛能够从这些文字中感受生命的活泼与跳动。为了反省自己，我为自己这两年不到(2015年1月到2016年9月)的生活做了一个流水账，排除了日常工作、会议、教学、交际、吃饭、杂务，以及偶尔的旅游和其他休闲，只把写作的时间罗列出来，大约留下了25万左右的文字。与我前两本编年体文集的篇幅相比，还是要少了一些。而且这些文字中，几篇较长的文章都是未最后完成的半成品，还不宜收入文集。所以我干脆把十多万

字的研究论文暂且放在一边，只收取那些比较短小的文字，编成这本小书，奉献于我的读者。也许读者拿到这本小书感到很轻，我的心却变得沉重，丝毫也没有那种完成了任务可以透一口气的轻松感。

2016年10月2日于鱼焦了斋

目 录

自序	001
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在河西学院的演讲	001
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的几件工作	029
陈鸣树教授访谈录·编者按	041
【附录】“我就是喜欢上课啊” ——陈鸣树教授访谈	043
梁披云和他的理想主义	047
为了精神家园永不荒芜	055
怀念毕修勺先生	062
怀念褚钰泉	069

关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记忆	077
回忆与感激	084
朝花夕拾未能忘	087
楼乘震和文化人的故事	090
金理的印象	097
周洋读书	104
序《新声诗体选集》	111
序《安娜的火车》	117
序《文学的生命》	129
序《雕刻水墨——倪建明版画》	136
读《洪鱼》	143
读《燃灯者》	150
读《北鸢》	157
读《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168
元气淋漓，高标独立	176
略谈电影《春蚕》的艺术表演	187
附录：流水账(2015.01—2016.09)	191

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在河西学院的演讲

同学们好！尊敬的黎书记、刘校长，河西学院的朋友们，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我这次来张掖，没想到能遇到来自兰州的朋友——作家张存学和马步升，我们能在张掖相会格外高兴。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下午就要回上海，所以只能有这样一个短促的时间与大家见面，但这是我期盼已久的。

我们学校，从张掖师专到河西学院，都与我有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初我第一次以我个人名义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间，就有一位来自张掖师专的老师，从他那里我不断听到“张掖”这个城市及其历史文化，心向往之。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个机会到张掖来看看，刘仁义校长实现了

我的愿望。他高瞻远瞩，启动了复旦大学与河西学院校际交流计划，尤其是我导师贾植芳先生的藏书到河西学院落户，学院从校领导到图书馆工作人员极其重视，迅速而认真地把这些图书编号、上架、编目录输入电脑。我开始还在想，今天我只是来参加一个揭牌仪式，可能还看不到这些书，没想到我已经看到了这批我非常亲切的书籍，就好像看到我导师本人一样。

在此我对河西学院的领导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先生已经离开我六年了，这批书应该就是他唯一的遗产。

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师母也在场）：“我们无子无女，也没有任何家产，所有财产就这几本书。”先生喜欢买书，散步时总是跑各家书店，有人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买书干嘛？”他说：“读书人如果不买书了，还像什么读书人？”先生以前也说过有关卖书的话，那是开玩笑的，他说：“一个读书人，如果沦落到要卖自己的书了，就好像要卖老婆一样的痛苦。”先生一生颠簸流离，1950年代前期，他在复旦大学教书，与师母住在一起，还收养了几个侄子侄女，难得的幸福安定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55年又被抄家入狱，师母后来也被送到青海劳改，家又破了。所以，他现在的藏书都是在1980年代以后慢慢购买积累起

来的。先生去世后，桂芙与我多次商量，怎么处理好先生留下的这批藏书。

我很感谢陈晓兰，她主动向桂芙提出，把先生的书捐给河西学院。我也非常感谢河西学院接受了这些书！

贾植芳先生捐赠的图书中，没有古代善本或者很有版本价值的民国藏书，但是贾先生与图书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退休前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大概是1983年到1987年，他工作到71岁才退休。再早些时光，我有幸认识贾先生也是在图书馆，但不是在学校图书馆，而是在中文系的资料室。

1978年下半年，贾植芳先生政治上还没有平反，他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但已经不受监督了，只是让他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我是1977年“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第一届考进复旦大学的，我们那一届进校是在1978年的春天。贾先生是第二个学期从被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那时中文系资料室还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他来了以后，资料室面貌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个老人在那里不停地讲话，非常热情。我们在他的言行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出他是个长期受迫害的人，他看我们同学在资料室里读书，不仅会主动给你推荐书，还会指导你如何阅读。

大一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同学李辉，开始在一起研读巴金的书。贾先生看到了，他主动对我们说：“你们在读巴金的书，你们要不要看一看西方人对巴金的研究？”先生推荐我们读美国学者奥尔格·朗(Olga Lang)研究巴金的著作：《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Pa Chin and His Writings: 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是英文原版。他借给我们看了以后，问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就说，看了以后大开眼界。他又问我们能不能翻译几篇？当时我们还是大二学生，什么都不懂，也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叫做学问，文学又怎么研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翻译这些外文文献。后来我们知道，贾先生当时正带领一个教师团队编辑巴金研究的资料专集。他不仅指导我们做文献翻译，还指导我们阅读巴金的著作，讨论巴金的思想。就这样，我们毫无拘束就与贾先生熟悉起来了。

我和李辉写的第一篇研究巴金早期思想的论文，是在贾先生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巴金在“文革”中被打倒，有一个很重的罪名，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理解“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罪名，我们阅读巴金的作品，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读完以后觉得巴金小说里讲的都是革命啊、反抗啊，看不出什么无政

府主义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巴金的早期思想，说巴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文章写完以后，我们就向贾先生请教。先生就问我们：“你们是一般地阅读巴金作品，还是要研究巴金？”我们说：“我们要研究巴金啊。”（什么叫“研究”？现在想想，有些汗颜。）先生就说：“如果你们要研究巴金，就不能依据《巴金文集》研究他的早期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集是1958年到1962年编辑出版的，那时无政府主义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中国受到了批判，巴金在编自己文集的时候，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作了修改，把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内容都删掉了。贾先生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真做学问，就不能看被修改过的文本，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作家当年的真实思想。你们要去图书馆，找初版本来研读。”那时，民国时期的初版图书我们是看不到的，图书馆也不对我们开放，通过贾先生的私人关系，我和李辉就跑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就这样一本一本地看，从旧报纸、旧杂志中去找巴金的文章，对不同的版本做了校勘。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慢慢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我和李辉第一本合作出版的著作就是《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也是贾先生推荐的，他还为我们写了序。可以说，如果不是贾先生及时指导我们，我

们可能也会写出研究巴金的文章，但观点和方法都是错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可能也是错的。后来我在巴金研究领域比较自信，因为我看过巴金以前的各种版本，还看过国外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文献资料，理解就比较全面。这样我就知道了怎么追求学术真实，怎么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讲真话。沿着这个道路，慢慢地成为一个学者。

我们对贾先生非常佩服。当时贾先生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我现在想，我和李辉那时候与贾先生那么亲密地交往，可能是被人关注的。那时学校里也有一些老师会提醒我们说：贾植芳是个“胡风分子”，你们不要多接触。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发现贾先生的日记里记了很多我和李辉到他家里聊天、跟随他学习的事情，他却不写我们的名字，而写小陈、小李。这些日记，李辉帮他整理出版了，李辉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的名字，贾先生说就是怕以后万一牵连我们。后来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他暂住的宿舍，先生住的地方很简陋，一幢小楼里住着许多人家，毫无隐私可言，先生的小房间里就是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小书架。那时师母还在青海。先生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经常在那个房间里聊天、喝酒，吃一些花生米啊、酱菜啊。就那样聊天、聊天。

如果说，我对现代文学还有些研究，那么，这些知识

主要不是上课听来的，而是与先生聊天聊出来的。跟着导师，听他今天说这些，明天说那些，慢慢地就把我引进了现代文学领域。我所知道的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故事和教科书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历史细节不一样，认知价值也不一样。可能有的同学读过我主编的文学史，或者是我写的著作，你们就会感觉到，我的学术观点和主流教科书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不是我杜撰的，而是与我受到的教育直接有关。

那么，贾植芳先生给了我什么教育呢？为什么说他是“胡风分子”呢？下面我要讲讲贾先生与鲁迅、胡风这样一个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贾植芳先生出生在山西襄汾的农村，少年时期在太原读初中。当时太原的成成中学是一所有名的中学，许多老师都是北师大的毕业生，他们把“五四”的火种传到了那里。初中毕业以后贾先生就去了北京一个教会学校读高中，在那里打下了英语的基础。高中期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抓到牢里。先生的伯父很有钱，是个买办。贾先生被抓以后，伯父花钱把他赎了出来，然后把他送到日本去读大学。先生到东京的日本大学读社会学，才读了两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又放弃了

文凭，回到国内来参加抗战。他伯父知道后写信给他，叫他不要回来，在那边好好读完书，但他人已经跑到香港了。于是伯父再写信给他，说：“你千万不要回中国，我马上给你钱，你到欧洲去读书。你不愿意拿日本人的文凭，那么你到欧洲去读书，也可以留在香港读书。”他伯父生意做得很大，在香港都有买卖。可是贾植芳先生血气方刚，还是回来了！1988年，我陪先生访问香港，当年与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同学都留在香港做生意，退休后每天聚在一起打麻将。先生去香港，他们就去机场迎接他，请他吃饭，都非常开心。那时候我问先生：“您当时如果不回来，可能现在也在香港当个太平绅士了。而您回国参加抗战，前前后后坐了几次牢，苦了一辈子。您觉得值得不值得？”先生亲口对我说：“我还是会回来的。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很无聊。”——这就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

先生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前线打仗，利用他的日语优势，在军队里搞宣传和翻译工作。在前线，他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发表在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先生在日本读书期间参加了东京的左翼作家活动，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先生在东京街头看到一本中文刊物《工作与学习丛刊》，他从刊物的编辑风格和作家阵容，觉